

近代儒學研究的新拓展 ——《傳統的張力》評介

呂厚軒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近代以降，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西方文化也隨之“東漸”，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間的中西古今新舊之爭也就此拉開帷幕。由於中國傳統文化在短時間內無法適應時代變革的難題，所以備受質疑與譴責，而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體的儒學，自然被看作中國落後的罪魁禍首和社會變革的阻礙，從而飽受衝擊和“打倒”之苦。尤其是現代化理論的出現及傳統與現代二元模式的流行，更是立儒學於社會進步的對立面，對儒學不能做出公允的評判。

近年來，學術界雖然已認識到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模式有許多的弊端，反對全盤的否定傳統，但如何在理論上突破二元對立模式，並結合具體的社會實踐證明儒學的現代價值，還有待學術界的進一步努力。張昭軍博士的新著——《傳統的張力——儒學思想與近代文化的變革》(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在這方面做了一些積極有益的探索。

張昭軍多年來對近代儒學的研究抱有極大的興趣，《傳統的張力》也是他繼《儒學近代之境——章太炎儒學思想研究》之後研究近代儒學的又一力作。該書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以點帶面、新見迭出

在《傳統的張力》一書中，作者以個案研究為主，選取了龔自珍、曾國藩、張之洞、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章太炎和孫中山八個人作為研究對象。雖是個案研究，作者的深層目的還是想以點帶面，通過對他們的研究給我們展示近代儒學演變的基本趨勢。通過對前三人經世思潮的探討，作者試圖回答儒學能否結出現代性碩果這一問題；而對後面五人的研究，則是想看他們在近代語境下如何利用儒學書寫現代性。前者在強調儒學價值的時候並不回避其對現代化的負面影響，後者強調儒學雖有不足，但對於近代中國的轉型仍有重要作用，因為只有在一般大眾所熟悉的語境中介紹現代性，才更容易被他們接納，新的東西才更容易找到落腳之地。

衡量一部學術著作的價值，有沒有創新是一重要標準。作者所選取的研究物件，都是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研究這些人物的成果多不勝數，但就在這種情況下，作者仍然能對每個研究對象發前人所未發，多有創新，實屬不易。比如，通過對龔自珍儒學思想的考察，作者提出，關於經世思潮的淵源問題，傳統的觀點認為經世思潮與今文經學密切相關，但他經過多方攷察後認為，經世思潮作為當時的社會潮流，為漢學、宋學、史學等眾多學術流派共同主張。通過對曾國藩的研究，作者也發現，一向被認為與踐履篤行無關的晚清理學，在曾國藩身上發生了巨大的改變，經過曾氏的改造與發揮，道德主義色彩濃厚的理學與功利主義的經世實學和合為一，衍生為具有實踐品格的理學經世思想，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一思想促進了曾國藩洋務思想的形成。通過對嚴復思想的研究，作者認為，從儒學視角看，近代並不存在所謂從“離異”到“回歸”問題。可以說，對書中的每一個研究對象，作者都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這些凝聚著作者智慧和心血的創新點，也是這部著作的

主要價值所在。

除了在觀點上多有創獲外，在學術方法上，作者也做了有益的探索。正如胡維革先生在序言中所說，作者的“地面進攻”（對史實進行創新攻證，對史料進行重新梳理，對有的觀點進行重新闡釋）和“高空轟炸”（不僅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也借鑒了西方其他學術流派的觀點，不僅運用史學研究方法，而且借鑒了其他各學科的研究方法）相結合的方法，使得《傳統的張力》一書達到了較高的學術水準。

二、批判繼承、實事求是

史學研究，力求客觀是起碼的標準，但是，對於研究者來講，真正能拋開個人的感情因素、實事求是地分析和評價所研究的對象並不容易做到。支持儒學的人，如獲至寶，把儒學看成中國的希望所在；批判儒學的人，則棄之如弊履，唯恐挖不掉儒學的根。這種二元對立的模式，多次在中國近代上演，至今不絕。但在《傳統的張力》一書中，作者卻很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他一方面肯定儒學在中國近代文化變革方面的積極作用，同時也力圖說明：傳統儒學雖然蘊含著經世思潮這種走向近代化的可能因素，但其衛護封建道統的負面影響仍是我們不可忽視的，且不可因此而高估儒學對於近代化的積極意義。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說的：傳統是流動於過去、現在與未來整個時間性中的一種複雜“過程”，而不是在過去就已凝結成型的實體，傳統的真正落腳點在“現在”和“未來”，而不是消逝的“過去”。近代儒學思想既是古代儒家傳統的繼續，又蘊含著現代文化的基因，只有將傳統與現在和未來結合，實事求是地分析，才能確定傳統的利與弊。

作者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可以舉這樣兩個例子。一是關於康有為新儒學思想與西學的關係問題。按照近些年學界流行的“內在超越”之說，研究儒學的人往往把康有為作為“自改革”（傳統內變革）的代表，目的是強調中國文化本身能夠實現現代化。作者沒有採取人云亦云的做法，而是以史料為基礎，明確指出：今文經學雖是康有為發明新儒學必經之步，但舊學的薰染，並沒有使其化蛹成蝶。“西學是康有為建立新儒學不可或缺的條件，完全可以說，如果沒有西學介入，就沒有後來思想的昇華。”再如，作者在論述孫中山對近代民族主義思想的貢獻後，不為賢者諱，能夠以史實為例，辯證地指出：“毋庸回避，傳統儒學對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也有負面影響。”

三、注重實踐、同情瞭解

儒學本身就是一門純粹的文本上的學問，它是與實踐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近代以來，由於中國社會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這就決定了近代儒學具有較強的實踐品格。所以，研究近代儒學，只有與社會現實及人物本身的實踐相聯繫，我們才能真正領會儒學在近代所發生的一些具體的改變，而不能僅僅從傳統上或從文本上來解釋近代儒學。《傳統的張力》對於曾國藩的研究就鮮明地體現了這一點，理學末流在文本上是疏闊空談，但經過曾國藩的改造，衍生為具有實踐品格的經世思想，如果不瞭解曾國藩的切身經歷，很難解釋這樣一種轉變。而作者就抓住了這一點，更多的是從曾國藩為官的實踐中理解他的經世思想，所以能別有收穫。此外，儒學特殊，還在於它還是一些近代思想家的生命寄託，承載了他們的價值訴求和人生理想，所以，不能深入體會這種情感的人是很難真正深入到那些思想家們的心靈深處，體會他們對儒學的理解和闡釋。在對康有為這一個案的研究上，作者顯現出了他對這一現象的敏銳把握。理解了這一點，才能理解康有為為何在晚年對孔教傾注如此的熱情，才能更深刻的理解康有為。正如作者所得出的結論：並不是他們晚年變得保守了，變的是時代，不變的是他們對儒學所傾注的熱情。

作者注重同情之瞭解，在論述章太炎宗教思想一節中有較好體現。眾所周知，章太炎主張無神

論，也是近代反對設立孔教最力者之一。他在日本講學，凡尊奉孔教者不允入內。耐人尋味的是，既然章太炎反對設立宗教，為何又提倡建立新佛教呢？作者分析指出，章太炎建立的佛教不是通常意義上的佛教，而是經他改造、重新設計的無神佛教。其目的不在於宣傳佛學，而是利用佛學“眾生平等”等思想建設革命道德。表面上看，建立新佛教與章太炎的儒學思想無關，實際則是，“它是 20 世紀初期章太炎認為儒學已不足以陶鑄革命道德的背景下所找到的重建價值的源泉和增進道德的載體”，從而緩解因批判儒學所帶來的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緊張關係。如此論說，深入學理而又設身處地，令人信服。

當然，《傳統的張力》一書，也並非完美無瑕，作者在前言中批判了傳統與現代的二元的研究模式，但其中仍有個別的觀點還帶有這種模式的痕跡。不過，瑕不掩瑜，作者在這方面所做的探索，必將對中國近代文化史的研究起到積極的推進作用。

傳統的價值，就在於傳統的張力。沒有停滯不變的社會，也沒有一成不變的儒學，正是變革中的儒學，才真正體現儒學的價值，所以，進一步加強對中國社會轉型時期儒學的研究，對我們認識近代社會的轉型意義重大，期望在這方面湧現出更多的研究成果。